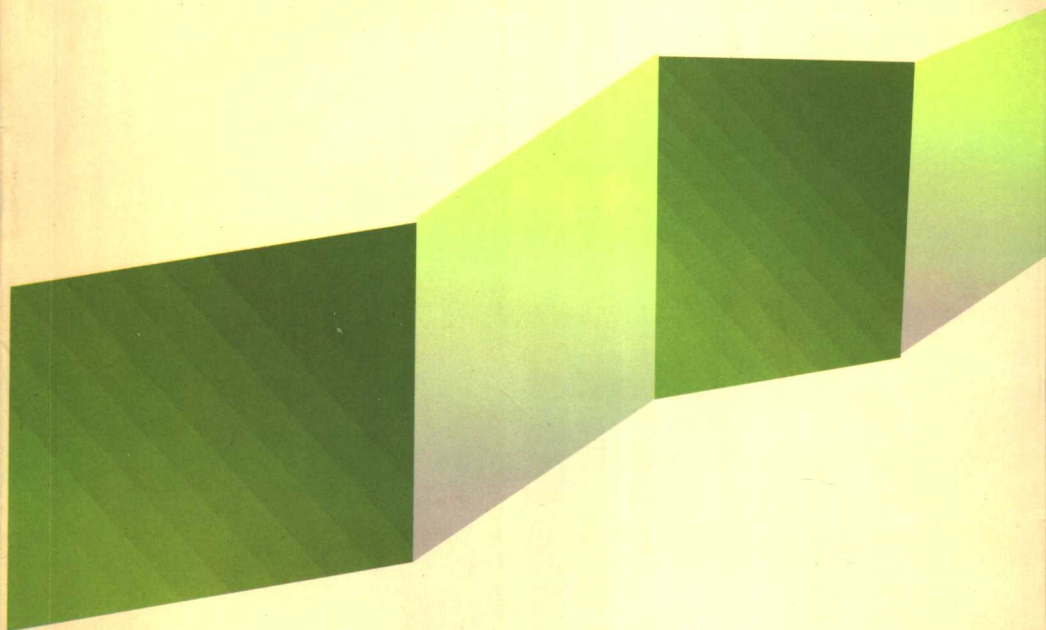


多维的验证

DUOWEI DE YANZHENG

顾广梅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DUOWEI DE YANZHENG

多维的验证

顾广梅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维的验证/顾广梅著.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6. 8

ISBN 7-81067-926-0

I. 多… II. 顾…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8487 号

多维的验证

顾广梅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鱼山路 5 号 邮政编码 266003

网 址 <http://www2.ouc.edu.cn/cbs>

电子信箱 hdcbs@ouc.edu.cn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 82032644(传真)

责任编辑 纪丽真 电 话 0532-82032846

印 制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mm×1 168 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朱德发

近几年考出的在职博士生既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强烈的学术激情,所以一入学就进入研究状态,学术成果不断涌现,甚至有的写出令人惊喜的学术著作。

摆在我面前的顾广梅的新著《多维的验证》,就是我看好的一本。其中试图从阐释学、女性诗学、小说美学等方面出示现代中国文学的多种面相,不仅富于新意,还给人深刻启示,闪烁着新的思想火花。一是研究范式的更新。流变了近百年的,不论作家作品或者思潮流派,应该说异彩纷呈,展示出多幅现代性面孔;而学术界或评论界对它们的研究或评说,由于长期受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制控和影响而形成了强固的研究范式或僵化的思维定式,几乎把所有的文学理论形态和文学创作样态都装进一种思维范式或一种价值体系来阐释来评述,甚至表述的学术话语也如同一个模型里铸造出来的。但是,这种近似机械的凝固的研究模式已不适应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新崛起的一代学者首先向传统理论模式发起强有力的挑战,借鉴世界先锋理论思潮来更新研究范式,给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气象,营造了新景观。广梅早在攻读硕士学位时就对新思维新方法有浓厚兴趣,并尝试性运用新理论范式写出了多篇有新见的论文;随后留校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仍沿着既定的路向于学术研究上进行创新趋优的追求。

2004年她考取博士后更加自觉地在科研中注重研究范式的革新,不论对阐释学的运用或是对女性诗学的观照,都能根据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获取较有新意的研究效应,即思维范式的更新生发出新的思维成果,为后起学者开创的学术新局面增了彩。二是探寻新的突破点。以新的理论视野去审视已有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成果,从研究的研究中去发现薄弱点、疏漏点、矛盾点和误读点,形成既新且真的问题意识,并带着问题重新阅读重新感悟原创文本,以化入化出的感性与理性相融合的思维方式去解读文本蕴涵的人性密码和人文精神,给出了一些富有个性化和理论深度的学术阐释。曹禺及其创作的研究成果几近饱和程度,可以说能采取的视角能运用的办法都在曹禺其人其文的探讨过程中实验过,并获得不少优质学术成果;而广梅却在重读曹氏原著及对他的研究著述中,发现了不少误读,于是写成《误读之维:曹禺及其创作》和《接受学细读:〈雷雨·序〉》,既破解了曹禺研究上的一些疑点和难点,又亮出了自己的新见和看法。张承志的研究也是个热点,评述成果不少,当然也存有悖论点或疏漏处,《张承志研究述评: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有针对性地作出了有见地的评述并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三是拓展新的研究域。文学研究不同于开采矿藏,矿藏再富也有采尽之日,然而文学这座矿藏却不是物质构成的,乃是作家用他的形象思维、生命体验和精神因素营造的情感世界,具有无限的感受和阐释空间。因此现代中国文学作为一个独特的审美系统和文化宝库,是永远探究不尽的,总是余留不少空白点或处女地;细心的研究者是会以新的眼光窥测新研究域,发现新课题的,以拓展现代文学探索的天地。这些年广梅好像一个勤奋的探矿者,在现代中国文学的文山书海中不断发现新矿苗,觅出新的探察口,找到新的研究课题。从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文学赤潮的洞察中,她发现了“女性反成长叙事”;从对现代短篇小说的浏览巡视中,她发现了“女性疾病叙事”,《女性反成长叙事:20世纪

30年代革命故事再发现》和《女性疾病与隐喻：三个短篇小说带来的启示》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现代文学研究空白，更拓展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四是作家论的改写。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学术史上，茅盾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连续写了《鲁迅论》、《王鲁彦论》、《徐志摩论》、《庐隐论》、《冰心论》、《落花生论》等作家论，既表明茅盾是撰写作家论的高手，又说明他开了现代文学研究写作家论的风气之先，正是沿着这个学术传统几代学者为现代文学作家写了不少有特色的作家论，到了年轻一代学者手里，“作家论”的写作呈现出新的学术风貌。广梅刚踏上现代学术征途就敢于写作家论，既显示出她敢于突破的学术勇气又显示出她有较强的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能力，从对老舍、余华其人其文的读解中便可察觉出她这方面的勇气和能力。虽然不能说它们有什么重大突破或者说已达到“重写”的高度，但是应该把它们视为对“作家论”的尝试性的“改写”，不论写作模式或文本内涵都有些新的开拓，尤其《余华（上）：走在文学前面》的创新性更多一些。至于《小说创作探讨：想象世界的方法》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为小说美学增添一些新值，表现出研究主体理论上求新的强烈愿望。五是跟踪评论显新识。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前景无限深广，新人新作层出不穷，因此致力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学人应具有一种跟踪新人新作评论的学术激情，这不仅能够激活学术思维、永葆学术青春，而且还能获得新的审美信息、审美感悟和新的理论视野、研究方法，以推动现代文学研究跟上学术前沿的步调。广梅作为现象的文本研究，如《张承志：精神与文本的三种困境》、《纪宇〈‘97诗韵〉：抒时代之情，践历史之约》、《左建明〈雨夜清柔〉：温柔的钟声荡激灵魂》，都可以发现其敏锐的艺术感悟、独特的认知思路和不凡的学术见识，为当下文学评论增加些微的学术含量。

广梅虽然尚未最后完成博士学业，在学术探究上仅仅是初试锋芒，但却显露出一些将来有可能成为优秀女学者的潜能。首先

是敏于创新的能力。人文科学必须创新,这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也是做个创新型学者的必备条件;但是学术创新谈何容易,只有那些思想活跃、性格开放、勇于探索、善于发现、富有联想、务实求新、永远进击的学人,才有可能在科研实践中展示出不俗的创新能力。广梅在有限的研究中已初步显现出创新能力的敏锐,对于一个女博士来说这是弥足珍贵的。其次是长于整合的能力。这里的整合是指综合,只有分析没有综合,是难以形成新的科研成果的,故而整合能力对一个学者来说至关重要。固然搜集资料、整理资料、阅读资料、感悟资料,是人文科学研究的先导;但是不能对已感悟和认知的处于分散游离状态的思维碎片进行梳理性的整合或整合性的梳理,那就不可能形成一个严密的逻辑系统而生产出新的科研成果。不论是阐释学视野还是女性诗学构架中的作家、文本研究,均可看出广梅有较强的整合能力。再次是从不言败的争胜好胜的内在品格。“争强好胜”对于学人来说似乎人皆有之,如果把这种性格用于处理日常人际关系,那就会出现一些不必要的或毫无意义的麻烦或紧张;若是将其用于学术研究,那就能使“争强好胜”转化为在科研上创新趋优、锐意进取的内驱力,成为一个学人必备的优秀品格。试想一下,在艰辛的科研道路上,不“争强”不“好胜”,怎能攀登学术高峰?作为一个导师,我深知广梅在科研中确以“争强好胜”的性格素质作为一定的潜在动力的。

对于广梅其人,治学道路虽然艰难而漫长,但却充满了诱人的魔力,布满了芬芳的鲜花;只要能聚精会神、专心致志地在学术研究上孜孜以求,扬长避短,戒骄戒躁,就一定会达到光辉的彼岸。是为序。

草于 2006 年 1 月 10 日

目 录

序	朱德发(1)
---	--------

第一章 在阐释学视野中	(1)
-------------	-----

一 释义困惑:20 世纪 30 年代马克思主义诗学解释学的反思	(1)
二 误读之维:曹禺及其创作	(14)
三 接受学细读:《雷雨·序》	(32)
四 张承志研究述评: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末	(42)

第二章 作为现象的文本研究	(58)
---------------	------

一 鲁迅启蒙小说:示者与看客的独特叙事模式	(58)
二 老舍:作为思想启蒙者与文化批判者	(65)
三 余华(上):走在文学前面	(86)
四 余华(下):写作理想与文本实践的悖论	(105)
五 张承志:精神与文本的三种困境	(120)
六 纪宇《'97 诗韵》:抒时代之情,践历史之约	(133)
七 左建明《雨夜清柔》:温柔的钟声激荡灵魂	(143)
八 现代中国文学史写作:巴赫金复调诗学之启示	(146)

第三章 在女性诗学的构架内	(157)
---------------	-------

一 女性焦虑:中美自白派女诗人趋同心态	(157)
---------------------	-------

• 2 • 多维的验证

二	边缘处的女性幻梦:中美自白派女性诗歌艺术 风格比较·····	(172)
三	女性疾病与隐喻:三个短篇小说带来的启示 ·····	(188)
四	女性反成长叙事:20 世纪 30 年代革命故事再 发现·····	(200)
五	女性成长另类书写:《丽莎的哀怨》和《冲出云围 的月亮》再读解 ·····	(212)
六	青春之后怎样:“70 年代出生”女作家的意义 与局限·····	(220)
第四章	探讨小说美学·····	(224)
一	小说创作探讨:想象世界的方法 ·····	(224)
二	现代写作探讨:意义·特征·素养·方法 ·····	(236)
参考文献	·····	(253)

第一章 在阐释学视野中

一 释义困惑:20 世纪 30 年代 马克思主义诗学解释学的反思

1930 年《拓荒者》第 1 卷第 3 期刊发了冯宪章的批评文章《〈丽莎的哀怨〉和〈冲出云围的月亮〉》(以下简称为“冯文”),紧接着第 4、5 期合刊上登载了华汉(即阳翰笙)的批驳性文章《读了冯宪章的批评以后》(以下简称为“华文”)。这两篇文章从不同侧面彰显了解释者对文本意义释义的困惑与探寻,也折射出 30 年代文学意义生成与解释的复杂文化语境,更透露出本文诗学与理性诗学之间错综交互的关系。对这两篇批评文章进行比较阅读,无疑有助于我们厘清 30 年代马克思文艺诗学解释学的若干理论建设问题和实践性难题。

(一)“两步走”阐释框架和阐释焦虑

冯文在阐释蒋光慈后期创作的带有明显实验性、探索性的两个小说文本《丽莎的哀怨》、《冲出云围的月亮》时,采用了当时左翼批评家们流行使用的“两步走”式的阐释模式,即先评判文本内容上的优长短劣,再分析其艺术形式上的特征。关于此,左翼权威批评家茅盾在 1932 年《〈地泉〉读后感》一文中从理论上做了经典论述:“一部作品在产生时必须具备两个必要的条件:①社会现象全部的(非片面的)认识,②感情的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两者缺

一,便不能成功一部有价值的作品,至少写作此类作品的本来的目的因而不能达到;不但不能达到,往往还会发生相反的不好的影响。而这不好的影响也是两方面的,一在指导人生方面,又一则在艺术的本身发展方面。”^①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两方面的总结,反映着批评家观念上的二元对立,进而又构成左翼文学批评观照、阐释文本的主要叙述模式。其实,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将社会意义和艺术风貌进行观念上的二元对立,容易使批评者和作家们的理性认知与审美体验出现断裂,进而造成批评与创作的模式化、概念化,甚至会出现批评八股和标语创作。

冯文正是以这样的阐释框架建构起他对蒋光慈两个小说文本的理性言说和意义探寻。文章先是指出《丽莎的哀怨》“表现了俄罗斯贵族阶级怎么的没落,为什么没落;并且暗示了俄罗斯新阶级的振起”,继而分析了文本的艺术价值所在:“《丽莎的哀怨》已经脱离了标语口号的形式,而深进了一步——走上了适合新内容的新形式的道路的开端。”“与其说《丽莎的哀怨》是一部小说,无宁说它是一部散文的诗,诗的散文。”同样,冯文对《冲出云围的月亮》的诠释也首先从思想内容上剖析其独特价值:“表现在‘八一’事件失败之后的三种思想的倾向”,“是很健全的这一时代的表现”,接着又进行了形式方面的解读。

从表面上看,冯文很中规中矩地采用了“两步走”的阐释框架,但仔细考察,会发现它与当时的左翼经典批评还是有一段距离,这种距离也正是华文对之批驳的原因之一。内容与形式的两步走,在其他左翼批评家那里通常以内容批评为主,以形式批评为辅,即使是矛盾的作家论,也以追求作家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为鹄的。但是冯文在对蒋光慈两部小说文本进行解读时,竭力平衡内容批

^① 载《地泉》,上海湖风书局1932年7月版,转引自方铭编:《蒋光慈研究资料》,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8页。

评和形式批评的分量比重,几乎是均匀用力地运用了这两种批评,可谓用心良苦。从一开始完成了对《丽莎的哀怨》的社会——政治的评价后,文章这样过渡:“然而,虽然说‘在某一文化的勃兴期,尊重内容;开花期,内容与形式调和并重;而崩坏期,形式过重。’中国普罗文艺,正在勃兴期间,当然主要的在内容,主要在社会评价——政治的评价。但是‘形式必须适合内容,内容也必须适合形式。’(蒲列汉诺夫)‘不接受形式,就不接受内容的某一方面。’(普列汉诺夫)所以‘无产阶级理论家也可以作(并且必须作)艺术作品的形式上的评价。’(卢那卡夫斯基)就是说我们来作美学——艺术的评价,并非完全没有意义。”这段话的表意目的很明确:形式评价不可或缺。但在话语表述的方式上,冯宪章把两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四句相关论述连缀起来,如鲠在喉、如履薄冰般地完成了自己的意义表达:“作美学——艺术的评价,并非完全没有意义。”比之他在随后分析王曼英浪漫行动而加注“大意而已,因手边没该书”时的那份随意轻松,这种引用嫁接经典理论来阐发证明当时带有政治意味的文学话题的小心翼翼,实在令人感叹批评家真的如“带着镣铐的舞蹈”。

从更深层次看,这种压抑式的意义表达,很可能正是批评家真正的阐释兴趣和兴奋点所在,也正表明了“在‘两步走’的阐释框架下,可能隐藏着批评家的某种‘阐释焦虑’”。这种阐释焦虑,是被弗洛伊德称之为“力比多”的东西,是潜意识层面的内容被表层意识所压抑的结果。冯宪章作为普罗诗派的诗人,在具体文学创作中的体验与经验,天然会使他对文学文本的解释有一种整体感和还原感,也就是说他的政治意识与审美体验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趋向于整合。所以,他的批评在显意识层面上虽然服膺于马克思主义批评,能积极运用社会、阶级、政治的观念来评判小说文本的社会价值,甚至为了服从于“革命需要”,也遵循着“两步走”的批评理路,但在潜意识层面又“回到内心”,迷恋着小说文本中那些充满诗

意的东西,如意味、抒情、美、词语等等。于是,这种显与潜的矛盾,表现在批评文本中就出现了冯文对内容与形式两部分批评不偏不倚的分量分布。

正是由于冯文在内容批评与形式批评上努力达到某种叙述平衡,以弥补“两步走”阐释框架的断裂感,并期以完成对这两个小说文本的整体性把握,才使得和它同属一个话语系统、同样运用社会学释义模式的华文十分尖锐地表达了以下不满:“一种新兴文学之有无政治价值和它的政治价值的高低,完完全全是基于这种作品对于无产阶级之解放斗争助益的多少来定,至于形式,虽然我们必须注意,但这毕竟是次要的问题,为什么呢?如果没有好的内容而仅有好的形式,结果,只有助纣为虐的,‘诗的散文,散文的诗’的《丽莎的哀怨》,在宪章的心目中已经是了不得的形式了吧,然而,这样了不得的形式,却只能在那里帮助着它的内容去激动起读者对于白党的同情与哀感!”在华汉看来,内容第一,形式第二,离开内容的形式是没有价值的,甚至会带来负面价值。这种偏颇的观念在左翼文学批评家那里并不少见。比如钱杏邨在《关于中国文艺的断片》一文中强调批评初生的无产阶级文学不应该注重它的技巧^①,甚至认为注重技巧的批评是批评的最大失败。这与“文革”样板戏中“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不要资产阶级的苗”的戏谑比拟有异曲同工的荒谬感。不可否认,文学批评既有赖于文学实践,又会反过来指导具体的文学实践。文学批评者和解释者一方面建构着自己的理论话语,另一方面其理论话语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文学创作的未来走向。左翼批评家采用“两步走”来阐释文学创作,对当时的作家们影响极大,尤其是在其革命意识和审美体验尚未融合为一体时,创作上往往流于公式化、概念化,这成为困扰左翼文学创作的一大难题。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这种轻形式重内容、

① 参见钱杏邨:《文学与社会倾向》,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 年版。

内容与形式二元对立的文学观念和“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思维逻辑缺乏足够的理论警惕和辩证分析，以至于后来逐渐在十七年文学中演化为“主题先行”、“题材决定论”等危害极大的文学观念

(二) 政治批评与文学批评的政治性

很显然，冯文和华文属于同一话语体系，它们都采用了马克思主义诗学解释学模式，对蒋光慈两个小说文本主要站在阶级、政治的外部视角作出提问和回答，并试图揭示文本的社会价值。“革命”、“进步”、“无产阶级”、“时代”……是频繁跳跃在其中的关键词。但令人吃惊的是，它们对这两个小说文本的评价却大相径庭。无论是从主题内容上，还是从艺术形式上，冯文对其都作了较高的品评，其褒扬首先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如在内容上，肯定“《丽莎的哀怨》如一切社会科学一样，在告诉我们，旧的阶级必然的要没落，新的阶级必然的要起来！它在阐明社会进化的阶级必然的要没落，新的阶级必然的要起来！”“在政治的评价上，《冲出云围的月亮》是很健全的这一时代的表现”；其艺术批评，也基本上跟随社会评价的标准，“如果所谓艺术的价值，是在使明明目的宣传，而要令读者感不到自己是在被宣传的话，那么，《丽莎的哀怨》是值得相当高评的作品了。”（《冲出云围的月亮》）“特别是性格的描写，越发显得作者的进步的长足！”而华文正是从批驳冯文对这两个小说文本所作的肯定性评价入手的，完全否定了它们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探索，其主要依据是《丽莎的哀怨》的效果，“激动起一般读者对于他的敌对阶级的很大的同情”；《冲出云围的月亮》的题材选择虽有必要，但蒋光慈“完全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而不是无产阶级的观点”，这样，两个文本就都是“很严重的失败”。

应该说，文学批评的政治性是一个合法性存在，它明显呈现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伊格尔顿这样解释“政治”一词：“仅仅指我们

把社会生活整个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括的权力关系。”^①他试图证明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史的一部分。由此,文学批评和解释的政治性具体化为文学批评处理和组织社会问题的方式和能力。不过,文学批评的直接对象是文学作品,但“由于作品本身就是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和表现形式,因此,社会现实成为文学批评的间接评价对象,对于文学作品的批评,也必然成为对社会生活反映、认识和评价的一种特殊方式。文学批评经常体现着批评家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态度,文学批评的重要性也在于它在对文学作品、创作现象的分析和评价本身,显示着批评家对现实生活、社会现象的分析评价”^②。这样,文学批评就不可能不落下政治与社会的烙印。但值得重视的是,承认文学批评的政治性,并不等于将之简单等同于政治批评。后者以政治为评判文学文本的唯一尺度和最高标准,追求对文本的阶级阐释和政治定性,实际上不可避免地落入政治独断论的泥淖。

深究起来,如果说华文采用的是一种政治批评的话,那么冯文的批评则更多地体现了文学批评的政治性。华文之所以完全否定蒋光慈的两个小说文本,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批评标尺是唯一的、权威性的政治标准:凡是不符合政治要求的、不符合意识形态标准的,就都是不进步的,甚至是有社会危害的“反动”文学。相应地,华文的语义层便采用了许多政治训诫式的表述:“这是什么话!”“象宪章这种十足的观念论的批评,简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简直是对于作者和读者都是有毒害的。我们希望宪章努力的去克服!”……这里,说话者一面将文学批评和解释划分成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正如文学被划分成革命与非革命一样),一面运用这

① 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1页。

② 凌晨光:《当代文学批评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8页。

般自以为是的话语暴力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批评想象。相比之下，冯文之所以在文本的政治作用后面能看到“散文的诗，诗的散文”，能由衷地赞叹“有朵思退夫斯基的风味”，是因为它的批评话语中尚有文学性的重视，未曾全部政治化、意识形态化。

冯宪章的诗人身份和个体人格，使他对文学自身的话语符号系统与纯粹社会学话语符号系统的差异保持了一定的警惕。所以他写道：“如果把《丽莎的哀怨》的艺术的用语，翻译成社会的科学的用语的话，《丽莎的哀怨》如一切社会科学一样，在告诉我们，旧的阶级必然的要没落，新的阶级必然的要起来！……它在阐明社会进化的过程！它的作用，与布哈林××主义的ABC一些也没有两样！这是《丽莎的哀怨》的社会——政治的评价。”其中“如果……的话”的假设式陈述，已经昭显了释义者的理论警醒，即艺术符号与社会学话语之间只有在各自独立自足的前提下才可以做到将前者“翻译”成后者。实际上，真正的“翻译”作为对意义的理解与解释，不是将两种语言和文字进行简单的对译和转换，更重要的是“翻译者”对原文本在理解基础上进行能动地再创造。伽达默尔说：“只有当翻译者能把本文向他揭示的事情用语言表达出来，他才能惟妙惟肖地模仿，但这就是说：他必须找到一种语言，而且也是适合于原文的语言。因此翻译者的情况和解释者的情况根本上说乃是相同的情况。”^①由此可见，冯宪章在对小说文本进行解释，并寻求和逼近文本意义时，以“翻译”为喻，道出了自己作为解释者的立场：运用“适合于原文的语言”去揭示原文本的意义。正像日内瓦学派代表人物乔治·布莱所说的：“批评，就是使自我提高。是借助自己的激动把自己带到参与其思想的那些人所处的层面上去，更有甚者，是通过一种类似的运动上升，在精神空间中做

①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册），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94页。

着相似的动作,创造相同的形象,产生新的然而而是类似的思想观念,说着一种与他们语言不完全一样然而而是等值的语言。”(着重号为笔者所加)^①这种相似、相同、类似,这种“不完全一样然而而是等值的语言”,大概就是提醒解释者在运用某种理论进行文学文本的解释实践时,不要忘了面向文学自身发言和问话,不要忘了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些特殊因子和那些只能为文学所发现的东西。

实际上,每一种文学批评方法或模式都是选择性的,都有自己的局限,它们各自从人类文学总体经验中抽取自己感兴趣的那些元素。天文学家亚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讲述过一个寓言:有一个人使用一张网眼为3英寸的渔网来研究深海生物,在接二连三地捕捞起标本后,他断言所有深海鱼类的身长都不小于3英寸。爱丁顿暗示道,我们的捕鱼方法决定了我们能捕捉到什么样的鱼。^②带有强烈政治性、追求理念意味的马克思主义诗学解释学由于对文本客体化内容的恢复与还原重视不够,极易跌入单纯强调阶级斗争与经济决定论的庸俗社会学的泥淖。虽然伊格尔顿称“‘纯’文学理论是一种学术神话”,^③但这并不意味着另一种观念偏至是合法的,即完全将文学批评和解释演变为纯粹社会政治意识的文学图解,如此,真正的文学会死亡。由是,马克思主义诗学解释学必须回到文本客体化内容本身,最大限度地拓展释义空间,不仅要“揭示文学与社会政治、经济、道德、心理、风习、文化之间的联系”,还要“淡化思辨,回归实证,从文学与社会的交互关

① 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85~86页。

② Arthur Eddington, *The Nature of the Physical Worl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p16. 转引自伊安·巴伯:《当科学遇到宗教》,苏贤贵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9页。

③ 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1页。